

反战同盟概况

以日本的统治者——天皇为代表的军阀、官僚、财阀和大地主，在 1937 年 7 月 7 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席卷了华北、北中和华南。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致使日本军部的狂妄野心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日军占领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牵制了日军的侵略。

日本军部与德国和意大利侵略欧洲的行动相呼应，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向英美挑起战争，又把战祸强加给南洋各民族，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侵略战线。

战争使日本国内人民付出了无法估量的牺牲。在战场上，死伤了许多人，不少人当了俘虏。在日本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当了八路军和新

四军的俘虏。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待这些俘虏，他们还得到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志的指导和教育。最后，这些被俘的日本士兵觉醒了，为反对侵略战争，为寻求和平，他们参加了反战斗争。

八路军和新四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那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中国人民的子弟兵。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在江西省南昌率领三万人举行武装起义，由此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

当时的中国，由于 1925 年的国共合作建立起广州革命政府，革命军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进行了北伐。北伐军以破竹之势打垮了北洋军阀，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北伐战争因为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支援，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然而蒋介石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他背叛了革命，致使北伐遭到了失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成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开始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这次革命而举行的。起义部队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南下广东。但遭受很大损失。

当时，根据 1927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在江西省西部和湖南省东部组织起农民，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

1928 年 4 月，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与毛泽东率领的起义军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冈山上会师。

毛泽东制定了红军的军事方针：红军是党与人民政权、土地革命等所有地方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红军在部队中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建立起严格的群众纪律。红军进行依靠人民力量的

战争，必须把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平时分散兵力以动员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歼灭敌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把这一方针当作传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继承了下来。

后来，红军相继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然而惧怕红军发展壮大的蒋介石，于 1930 年至 1934 年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

日本军部乘中国内战之机，侵略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又侵犯了河北省东部。

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于 1934 年开始长征，1935 年到达陕北，完成了抗日的部署。当时到达陕北的红军有三万人。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高涨起来。这时蒋介石勉强地停止内战，不得不同意结成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服从国民党统帅部的命令，将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兵力为四万五千人，这就是八路军。蒋介石军队不抵抗日军，从华北战场逃之夭夭，八路军开进华北，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时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有时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抗击日本侵略军。

另一方面，新四军的前身是国内战争时期留在华南和华中的红军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于 1937 年 12 月 10 日，按照国民党统帅部的命令，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一万二千人。新四军在华中和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经过 1937 年到 1945 年的八年抗战，八路军的兵力从四万五

千人发展到三十二万八千人；新四军从一万二千人发展到十五万三千六百七十九人。

八路军和新四军积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华南和华中建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地方政府，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组织自卫军和民兵，发展生产，得到中国人民极大的信赖和支持，因而获得了发展。

从日本军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到 1944 年 11 月的七年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经常开赴抗日最前线，这使日本军部大伤脑筋。这期间，当了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达二千四百零七名。

中国共产党不把放下武器当了俘虏的日军官兵当作敌人看待，而把他们当作日本的劳动人民，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待这些日军官兵。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释放愿回家或归队的俘虏”的方针，而且还对俘虏进行教育。

得到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的日军俘虏，于 1939 年 11 月 7 日在朱德将军的指导下，在山西省林县麻田村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觉醒联盟的最初组织者是杉本一夫，高木敏雄和小林武夫三人。1939 年至 1942 年期间，觉醒联盟发展成六个支部，即太行支部、太岳支部、晋东南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和山东支部。

在延安，在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志的指导下，森健、春田好雄等人成立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本部在重庆，鹿地亘是负责人）。反战同盟又在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和苏北成立了支部。

1940 年夏，在冈野进同志指导下，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了。1942 年 6 月 23 日创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接着 1942 年 8 月 26 日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诞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失败已成定局的 1944 年 4 月，反战同盟发展成为具有更广泛的政治纲领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944 年 4 月的华北联合会各支部的解放联盟成员总数达 223 人。其组织状况如下：

延安支部	75 名
晋西北支部	7 名
晋察冀支部	15 名
冀中支部	7 名
冀南支部	15 名
冀鲁豫支部	13 名
太行支部	29 名
太岳支部	11 名
滨海支部	15 名
鲁中支部	9 名
鲁南支部	7 名
清河支部	6 名
胶东支部	13 名
合 计	223 名

（同盟成员以外的日本俘虏人数已略去）

另外，在华中还有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和淮南支部四个支部，并成立了华中地方协议会。1944 年 5 月，成立冀东支部。

成立反战同盟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军部；建立一个给日本带来和平、自由和幸福的民主政府。

反战同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中国人民的援助，得到野坂参三同志的指导，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各地开展了英勇的反战斗争。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士兵的情况怎样呢？他们开始了解到战场上已陷入僵局，南方吃了败仗。他们对生活上的恶化和私刑日

益不满起来。被殴打的士兵有人逃走，有人自杀，军部虽然下令严禁“私刑”，然而并非想放弃那些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私刑”。士兵们对服役期满不让退役而愤怒。当时的老兵有不少人不是想退役后回到妻子身边，而是想继续呆在中国，这是因为他们即使回到日本，说不定还会被征入伍到南方去。

日益恶化的战况，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阿图岛上的玉碎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总是以一种焦躁的心情想着：“如果不尽早结束战争……”，不过依然抱有日本最后也许会打赢的幻想。这种精神状态往往促使士兵们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

于是，反抗上司的事件与日俱增。1940年，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七大队的士兵曾进行绝食斗争，他们叫来中队长问他：“这饭能吃吗？”结果，后来的伙食有了改进。三十六师团某四年兵，他满腹牢骚，最后打开粮仓取出东西，大家吃起来，但他没有受处分。还有三十二师团某见习士官打了五名老兵，被打的老兵把子弹推上膛去找见习士官，痛骂他一顿，还让他赔了罪。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的超期服役士兵六人，因为不能按期退役，以酒消愁，让中队长给打了。他们端起机枪就朝中队长打，最后军事法庭判处三人死刑，三人无期徒刑。中队长自己也自杀了。此外，日军内部的自杀和逃跑事件也在增加。以“坐骨神经痛”这种很难诊断的病为由想保重身体的士兵也多起来。

日军里出现的这些厌战情绪是很正常的，这意味着反战同盟的和平呼吁已经为他们所接受。

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同盟代表大会，正确地反映了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和不满，它起了很大作用，使日本士兵的反战活动更加切合实际。

这样，以延安为中心，组织上得到了统一，指导上取得了一致，因此反战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延安，每周有两次日语广播。广播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士

兵和日本侨民做宣传，同时也为了向在 frontline 活动的反战同盟传达指示。广播的内容，是与士兵大会决定的《日本士兵要求书》有关的具体消息，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报道，边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新闻等。但是由于电波太弱，在遥远的前线几乎听不到，后来就停播了。代替它的是，每周两次用罗马字发电报，以此指导各地反战同盟支部的工作。

大会认为，作为宣传工作的方式，搞联欢活动值得重视。

两个大会之后，各支部的工作面貌为之一新。以前在宣传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法得到了纠正。根据新方针，在宣传、联欢、武装宣传队和俘虏政策等方面都开展得很活跃。

宣传的主要形式，除直接向日军喊话之外，还给他们送传单、小册子和报纸等东西。1943 年发行的传单总数，在八路军地区有 83 万份，在新四军地区有 20 万份。各地每月出五、六种，在冀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发行 14 种。

从内容上看，一般是关于日本士兵生活上的要求，时事问题解答，还有唤起他们思乡和厌战情绪的。

送传单的方法，是通过伪军的伪政权向日本士兵送，或通过老乡送去。但是组织武装宣传队到碉堡附近去撒传单是最有效的。

宣传的效果有各式各样，在散发“不准打耳光！”这类传单之后，在某个中队里便出现了不打耳光的训示。如果传单上点了名声不好的军官名字，那个军官就变得老实了。据俘虏讲，不少日军士兵都看反战同盟的传单。

其次，使用较多的是“慰问袋”。它很受士兵们的欢迎。通过送“慰问袋”，反战同盟和日本士兵之间可以互赠信件和搞联欢。“慰问袋”里主要装日用品，因为他们担心吃的东西里面放了毒，所以就送些肥皂、毛巾、日记本和内衣等物。

有一个碉堡写来一封信，信中讲道，你们哪儿都去了，可就

是没到我们这里来，请你们送来吧。作为回礼，也有送来豆酱和海带的情况。随着逐渐与他们亲热起来，反战同盟也送些酒和生鸡。

互赠信件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包括贺年片、慰问信、致阵亡者的慰灵状和警告信等。但是得到对方的回信却很难，加上日军换防频繁，因此交换信件的成功率不高。用通信方式取得明显效果的，是反战同盟成员向原所在部队和战友写信。例如太行支部的松田君给战友写了信，部队里便传开了：“松田在八路军里还活着呢！”于是把阵亡公报发出去的中队长和管人事的慌了手脚，还有一个总想使用暴力，外名叫“青鬼”的小队长，接到列有他的罪状的警告信后，害怕了，不敢再干坏事了。

宣传上的另一种很奏效的做法是喊话。喊话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直接与日本士兵谈话，达到感情上的交流。谈话的内容是介绍反战同盟和同盟成员的情况，就时局和日军内部的状况交流意见，呼吁改善待遇。在向原所在部队喊话时，常常互相谈些家乡的事情和战友们的消息。因为没有扩音器，只好用喇叭筒喊，这样必须接近碉堡一百米或五十米的距离。因为有很大的危险，所以配备有武装部队，以防万一。

喊话是直接交谈。在谈不拢时就争吵起来。当骂我们是“卖国贼”时就立即给顶回去。不过也有象太行支部镰田君那样的情况，他同碉堡里的老乡谈话，他们一边流泪一边交谈，经过多次交谈便亲热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还有用电话喊话的方法。利用电话可以长时间通话。在一根电话线上接通后可以与五、六个碉堡同时交谈，这也是很有效的宣传方法。

如上所述，反战同盟的活动是以日军士兵为对象开展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部的重要工作，如对被俘士兵进行教育，正确地向中国的农民和部队的战士讲解反战活动的意义等。

在战火中从事反战活动，难免要付出牺牲。1941年到1945年，仅我们掌握的就有下述反战同盟的同志们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彦、大野静夫、吉田武、福岡留、松野觉、宫川启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田畑恙、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后藤勇、中山正、初田清三郎、浜田真实、砂原、住野、与津、富田、绀野等25位同志。

在编辑本书时，编委会曾邀请冈田文吉、小林武夫、津田秀、浜中政志、古贺初美等许多同志写些东西，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动笔，所以只好割爱了。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冈田文吉同志，他在1939年从网走监狱出狱时，接受了下述任务：根据当时在狱中成立支部的德田球一、市川正一、国领五一郎和西馆仁等同志的决定，必须与党的领导人野坂参三同志取得联系，向他报告国内的形势，同时希望他领导重建党的工作。冈田同志躲过严峻的天皇制警察的监视，经朝鲜潜入东北和华北，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延安与野坂同志会见。冈田同志到达延安后在野坂同志的领导下暂时呆在延安。1945年春，根据野坂同志的指示秘密回国，筹划重建党组织，于是他离开延安，途经北京，在郊区迎来战争结束。他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平解除驻北京、天津地区的日军武装。其后，他比野坂同志早一步返回日本，参加了党的建设。他的经历可谓波澜壮阔。其他许多同志也都有反战活动的丰富经验。我们曾设想把这些都收录在这本书中，但不得已只好另找机会了。

反战同盟成员回忆录编辑委员会编委：

吉积清 户仓一雄 渡边武利 秋山良照

1963年7月15日

走反战之路



1939年八路军120师359旅在五台县战斗中俘获日军数名，王震旅长与之交谈

当了八路军的俘虏

八路军的攻击

我这个纺织厂工人是 1938 年 1 月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正处在白热化阶段。

当时，我对“圣战”和必然取胜毫不怀疑，但在生疏的异国战场上生活，似有渡日如年之感，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服役期满返回家乡。两年零九个月已过去，总算有点儿盼头了。

我所在的中队驻扎在背靠山西省太行山脉高峰的榆社县城。

就是在这个时候，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百团大战，给驻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榆社一带的日军遭到攻击是从 1940 年 9 月下旬的一个晚间开始的。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吃上东西也没有喝上水，重要阵地相继失守。我守卫的碉堡也遭到八路军异乎寻常的勇猛攻

击，他们把碉堡下面挖通，从地底下爆破碉堡。尽管友军几次派飞机轰炸八路军，但是八路军的攻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猛烈。我的脚脖子和腰部中了炮弹和手榴弹的弹片，可是当时连包扎的时间都没有。

偶尔从国内寄来的日本报纸极力渲染“讨伐匪贼”的“战果”，把败仗写成“胜仗”，一本正经地在那里宣传“华北的治安”好转，“匪贼”在减少。然而，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却十分清楚。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瞧不起八路军，说八路军是一群连象样的武器都没有的“土匪”。

八路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了完全出乎预料的猛烈而巧妙的阵地攻击作战，在我们的心目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扰乱了我们的战斗意志。

就这样，到了第三天下午，一个中队的兵力几乎完全被消灭，剩下二十几个人丢下阵地逃跑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拖着疲惫和饥饿的身子，忍受着伤痛逃跑。可是在第二天晚上，我们迷了路，不知往哪儿走好，在山上来回兜圈子。无意中我们陷入八路军的伏击包围圈，八路军的手榴弹从山上一齐向我们投来。几个一起逃跑的战友乘着漆黑的夜晚突围了，可我由于脚脖子负伤无法跟上，转瞬间掉了队，一个人陷入了一筹莫展的绝境。这时我紧握手中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打算同归于尽，但在这决定性的一瞬间脑子里又产生不自杀的念头。于是我站在悬崖边上拉开手榴弹保险盖向追过来的黑影投去，然而就在这同时八路军投来的手榴弹在我的眼前爆炸了，我感到手腕子一阵烧疼，一头栽到深谷里。

刺刀在我眼前

当我苏醒过来时，几支上有刺刀的枪在我眼前，这时我意识

到要用刺刀挑死我。当时我懊悔得咬牙切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月光下闪着寒光的刺刀。“杀了我吧！”我大声地喊叫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八路军没有杀我。

“讯问”开始了，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当上了敌人的俘虏，因而表现出愕然失色。头脑里常常考虑着战死的危险，从未想过当俘虏。部队教育我们当俘虏是“帝国军人的最大耻辱”，让“土匪”一样的人抓住，简直不堪想象。正因为这样，一时怎么也想不通被俘竟成了现实。

八路军用笔谈和手势讯问战友们的人数和去向，我没有开口。八路军战士并没有发火，他们不逼我，态度挺和气，这真让人不可思议。作为我们的一般观念，俘虏是当作敌人处理的，人权完全被剥夺。以前日军对待八路军的俘虏就是这样，我亲眼见过日军对待俘虏的许多残忍做法，也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这次自己陷入俘虏的境地，八路军却这样对待我，自然不可思议了。

一副担架把我抬到一个村子的老乡家里，主人端来一大海碗荞麦面条让我吃。已是四、五天没进东西，都有点饿过劲儿了。可是当了俘虏还吃“敌人”的东西，那不是丑上加丑吗？我不打算吃。许多八路军战士蜂拥来到我这儿，好奇地看着我，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一个战士还打着手势让我吃饭，可我误认为这准是在侮辱我，于是火冒三丈，两眼瞪得溜圆，突然把放着饭碗的桌子推翻，也顾不上脚疼猛地扑过去。我被拧住胳膊按倒在地，我想这次肯定要杀死我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八路军既没有打我，也没有生气。这样，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天亮后，说是送我去后方，他们让我骑着马离开了这个村子。

骑马时两腿下垂，负了伤脚疼得更加厉害了。我猛然发现牵着马的战士的肩上挎着一个篮子，几发装有引信的掷弹筒子弹

在篮子里相互碰撞着。可能是在战场上拣来的臭弹吧，不过这很危险，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我总是盯着它，不过没有言声，已记不得当时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了，恐怕只能认为当时自己无能为力吧。

幸好没有爆炸。在马背上看见前面有座山，这时我闪出一个念头：“现在还没转向，就是爬也能逃出去。”

沿着距友军驻地 30 公里的山路爬着逃走，肯定异常困难。不过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产生一种希望之光。我在不断地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和可以逃走的方向，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村子。

我被带到老乡家里，八路军战士成群结队地来看我，使我很纳闷，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微笑着，不那么惹人生气。

笔谈开始了。他们问：“你有父母亲吗？”“想不想家？”无意中感到他们挺有人情味的，我被这些问话给迷住了。一个人问道：“你当兵前是做什么的？”我接过递来的笔随便在纸上写了“纺织工人”，结果他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把手伸过来跟我握手，由于事出突然，我有些张皇失措（因为当时握手意味着阶级友爱，我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他们确实很简单，可是我不明白，对本来是敌人的我，为什么还这样亲热？

他们给我端来满满一面盆羊肉面条，看到这面盆吓了一大跳。可我心想为了逃走应该吃得饱饱的，因为实在太饿了，最后竟把一盆面条给吃个精光。

吃完饭后，八路军战士都出去了。

夜幕降临，外面漆黑一片。好似无人看守，我简单地以为他们大概知道我不能走动就不管我了吧。我自己悄悄地从屋里爬出去，可是刚刚爬出百米远就让人给追上，轻而易举地给抓住了。我已不抱希望，心想一定要杀掉的，于是闭上双眼。然而八路军战士反倒把我抱了回去，而且特别留神那只负伤脚。他们的这

种举动充满着真情实意，此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这次逃走虽告失败，但我依然没有死心。半夜里，又让我骑上马出发。到底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再往内地走，靠这只负伤的脚爬向友军驻地就越发没指望，因此心中有些焦急。可是这次行军很糟糕，马前马后都有战士紧紧伴随着，他们背的枪都上了刺刀，真让我动弹不得。

我们在山间小路上快步地走着，天空一片漆黑，又下起濛濛细雨。在马前面走着的战士肩上的刺刀不时地闪着寒光，我心中忽然产生一个疑团：“是不是把我带到大山里暗杀掉啊？”这么一想就总觉得有人要从背后猛扑过来似的，更加害怕起来，但又毫无办法。然而这完全是杞人忧天。

黎明时分到达蟠龙镇。早在榆社时就知道这个镇子是“土匪”的“巢穴”，因此到这样深的内地一切全完了，这意味着逃跑的希望破灭了。当时，这对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出乎意料，在这里可以讲日语，这使我张皇失措起来。我觉得这里的人温和热情，但他们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有听到。这是因为已有六天六夜没合眼，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支撑体力的一线希望是逃走，可是现在破灭了，我象散了架子一样如同一滩肉泥。也许是这个缘故，我睡着了。

翌日又骑马赶路。再想也没有用，索性不去想它，糊里糊涂地在马背上坐着。走了一整天，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一个村口。“欢迎，欢迎！”一个人讲起日语，我为之一惊。心想这不是日本人吗？可我弄错了。

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有几个日本伤兵在那里蹲着。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二中队的，也是在榆社遭八路军攻击时，部队被全歼，他们无法走动，被活捉了。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八路军的这次作战是在相当广的范围内进行的，我再次为八路军的实力而震惊。

后来，我与他们一起被收容到医院去，他们几个都是重伤号，其中有一个由于激战而精神失常，他表情呆板，总是阴沉着脸。尽管如此，因为有能一块说话的人了，也就得到了一点安慰。

谁是土匪？

医院是借用村里老乡的民房，把门板摆起来便成了简陋的病床。

这个地方是中国有名的太行山脉中段，到处耸立着峻峭的断崖，与其说是雄伟，倒不如说让人害怕。心想在这样的深山里怎么会有人家呢？

我们住院后，八路军派来一个叫小林的日本人（当时他是活跃在晋东南的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的成员，他已参加了八路军）照顾我们，还派来一位日本话讲得很不错的老陈，他们俩十分热情，给了我们许多帮助。

在这个医院里，一个名叫米尤拉的德国医生给我做弹片摘除手术。当时，我想：“如果不是被俘，作为‘光荣负伤’是应该做手术的，可是……”，完全站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毫无办法地忍受着这种侮辱，我真不知道这种窝囊气该向谁发泄。

手术做完没几天，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遭到八路军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驻华北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开始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日军在这次作战中采用的是战争史上空前残酷的焦土战术（烧光、杀光、抢光），我们所在的晋东南地区当然也没有幸免。

日军攻来时，为了避开日军的攻击，作为非战斗部队的医院必须日夜兼行向太行山中的大山里转移。那大概持续了十天时间。